

HUSHI

胡适

谈文学

TAN WENXUE

新编胡适国学文丛

胡适/著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胡适谈文学



新编胡适国学文丛

胡适 / 著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谈文学/胡适著.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13.1
(新编胡适国学文丛)
ISBN 978-7-5484-1310-3

I.①胡… II.①胡… III.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文集 IV.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8961 号

书 名: 胡适谈文学

作 者: 胡 适 著

责任编辑: 韩伟锋 付中英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阿元工作室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网 址: www.hrbc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310-3

定 价: 34.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销售!



总序

李世跃

2012年，是胡适诞辰12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年份，胡适的名字又一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成为许多媒体的话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说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季羨林语），不仅在哲学、史学、佛学、文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声名显赫，而且在社会活动、政治领域也为人瞩目，被世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二是他的名字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霄，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过许多成就辉煌的文化大师，诸如史学界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文学界的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哲学界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佛学界的虚云、汤用彤、任继愈……这些大师术有专攻，各擅所长，以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名扬四海，成为一代宗师。和这些大师相比，胡适的学术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驳杂而疏浅：他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写完，即成绝响；《白话文学史》也是写完上部，再无下文。至于他颇为自许的史学研究、禅学研究，也都随兴而起，无疾而终，不仅缺少系统与条理，而且许多结论的牵强与粗疏一直为学者所诟病。然而这些明显的疏失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自然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这样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胡适在

整个中国学术界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这种悖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回避，这种忽视或者回避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胡适解读的含糊和混乱：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究竟价值几何？为什么他会引出这么多截然对立的评价？在胡适去世 50 周年后的今天，对这些疑问的合理解答应当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胡适必不可少的前提。

这里，我们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这种悖论的诠释提供一条思路或一些启发，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提供一些素材。

胡适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很多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他所倡导的白话文理论与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声称：“文学革命之风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20 世纪之初，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当时普遍的文化诉求，在胡适之前和同时，酝酿并推动这种变革的文人很多，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等。与这些同人相比，胡适既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也是一个勤勉的实践者。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充分阐发了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意义，并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为其找出了渊源。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五言诗、七言诗，直到小说、戏曲，“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这种鲜明、积极的文学史观，不仅破除了几千年来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提倡和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学革命”有了广阔的前景和切实的可行性。在反复宣扬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胡适还通过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古典小说的考证以及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使自己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验证。至于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虽然稚嫩粗糙，但作为引领风气的实践，更为自己的白话文理论提供了鲜活的范例。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得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当时众多的喧闹中显得实在而详备、具体而生动，较之一般的号召和鼓动，来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从而产生的影响也就格外重大且深远。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为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题。

同样，胡适也曾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掀起过惊涛骇浪。1919 年 2 月，胡

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更是称赞该书有三大特点,即“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谈到对当时人的影响,任继愈说:“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当时的中国,西学渐入,中学凋零,许多有志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困惑和焦虑:国学前途何在?做学问的路径何在?胡适的见解和主张恰好解除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困惑,而这种“解除”的途径,就是新的学术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胡适曾极自信地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件事要算中国的一件大幸。这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口气之大、自信之深,国人之中确乎少有。然而,历史证明:胡适所言不谬。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完成了上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确而清晰的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颠覆了传统中国因循了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它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冯友兰,其学术观点与胡适始终分庭抗礼,但谈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也多次强调: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

与此相对照,胡适的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和质疑。胡适的史学理论的核心是倡导怀疑的精神,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和实验主义的方法,去整理、发掘古代学术思想,为现实的目标服务。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单纯以考察和证实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和以古为今的标准重新审视。在当时,历史进化论和厚今薄古的观点并非胡适的首创,严复、康有为、章炳麟等人都是历史进化论的鼓吹者,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提出过厚今薄古的主张。而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的怀疑和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摒弃,而是要从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对今人有益的东西来,在符合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对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评价。换句话说,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再造文明”。按照这种思路,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当前的立场出发,对史料进行新的组织和诠

释,批判地吸取精华,从而引发合乎现实需要的历史结论。在这里,历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现实人们有思想、有目的的“重构”。胡适的史学研究完全秉承了这样的宗旨:为了证明中国无为政治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他刻意强调了老子、孔子学说的相关命题;为了推广实证主义的理论,他重新诠释了清儒考据的治学精义。这样的史学理论一改中国历来“代圣人立言”的传统观念,着力强调现实的目的和实用的态度,把阐释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干预现实的工具,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开启了一代“疑古”的学风。当然,这套理论所具有的强烈主观特色和实用倾向也招致了许多批评,“把历史当做一个随意打扮的婢女”,就是对胡适史学观点众多质疑中最为人熟悉,也是最形象的恶谥。

胡适的佛教研究,实际上是他史学理论的延伸,而他的禅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神会和尚的生平,整理历史上从唐朝开始到北宋时期中国禅宗发展的情况,考察中国禅的建立过程。胡适通过对敦煌材料和日本发现的材料的考证和辨析,指出正是神会和尚的努力,南宗顿悟之说才成为中国禅宗的“真宗”。胡适把神会和尚的努力视为“佛教内部的一种革新或革命”,从神会开始,中国禅宗进入了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是把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的时期。仔细研读胡适关于神会的一系列论述,不难发现:胡适之所以对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的作用极力推崇,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是因为他坚决地认为,神会给禅宗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是带有转折意味和里程碑意义的。这种价值和作用,和胡适自许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改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他的佛学研究不仅在国内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他在禅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中不难发现,五四运动以来,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适的确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从哲学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在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变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现出独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创造力;他学贯中西又不拘一隅,俨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引领风气的通才。更为难得的是,在变革传统的过程中,胡适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浊扬清的同时,努力寻找一条基于传统而又变革传统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场可以有人反对,结论或许受到质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把中国文化从原有的

封闭传统带入了现代世界，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转变成现代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带给现代中国的不是几部经典的理论著作，也不是若干精辟的学术观点，更不是几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是一种立场、一种方法、一种面向现代的态度。李泽厚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顾颉刚、汤用彤、钱穆、金岳霖等，在学术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这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区别。”宋代禅师法演法师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说的是不要把治学的门径轻易示人。胡适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推己及人，“普度众生”。如果“鸳鸯”算是成果、“金针”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门径的话，胡适自己绣的“鸳鸯”或许并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针”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术，而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胡适虽然学术未为醇厚，但在许多领域依旧备受推崇的原因，或许就是胡适一生毁誉猬集，但历时百年无法被人忘却的理由。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关于胡适的思考还将持续下去，并会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胡适和他的思想自然成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编了这套“新编胡适国学文丛”。内容包括“胡适谈文学”、“胡适谈哲学”、“胡适谈史学”、“胡适谈佛学”，基本涵盖了胡适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文丛”在内容的选择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适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同时也力求表现其学术观点的完整面貌。因此，本丛书的编排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要选取最能反映胡适相关理论的代表作，如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理论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阐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著名论断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减省之外，编者尽量全文选录，不对原文做割裂和删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有助于读者做出客观的评价。

最后，在文章类型的选择上，编者也尽可能兼顾文体、论题、文笔各方面，力求全面反映胡适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史学卷”为例，书中既选录了胡适的中国史通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也选入了有关治史理论《研究国故的方

法》。在具体的史学问题上，则选录了《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一组文章，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胡适在史学实践中的方法运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读史随笔以及胡适晚年最为倾心的《水经注》考证的文章，胡适的整个史学风貌就显得丰富而生动许多。

这样的选文安排不仅有助于读者对胡适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对他学术思想的尊重和致敬。

当年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认为，这段议论借用到胡适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信每一个认真读过胡适作品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价。

(作者系人文学者，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目 录



第一编 文学改良论

文学改良刍议	2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10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导言	19

第二编 文学史论

《国语文学史》大要	48
《白话文学史》引子	53
《中古文学概论》序	56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59

第三编 文体论

谈谈《诗经》	112
读《楚辞》	119
词的起原	124
《词选》自序	133
《曲海》序	137
论短篇小说	140

传记文学 149

第四编 古典小说论

《水浒传》考证 160

《红楼梦》考证（改定稿） 190

《西游记》考证 220

《三国志演义》序 244

第五编 杂论

白话诗人王梵志 250

《孔雀东南飞》的年代 255

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 263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 271

编后赘语 277



第一编

文学改良论



◎ 文学改良刍议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未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 《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夔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

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贗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喋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
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朋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短竹獯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甚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 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 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